



20 世纪 80 年代香港学生群体 国家认同意识嬗变及现实镜鉴

杨亚红

(暨南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自香港回归以来, 培育香港学生群体的国家认同意识备受各界重视。追溯至 20 世纪 60、70 年代, 以学生社团为代表的香港学生群体普遍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认同感。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出现了根本性变化, 具体表现在本土意识上升, 对西方民主价值观的认同及高度关注香港政制等方面。造成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质变的主要原因为香港回归谈判启动后港英当局对香港社会的西式民主价值观塑造和外部势力干预。对 20 世纪 80 年代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嬗变的分析发现, 政府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与引导对青年学生的认同构建至关重要。当前培育香港青年国家认同, 应重点从完善国民教育体系、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及引导学生社团回归本职等方面着手。

关键词: 香港学生群体; 国家认同意识; 意识培育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2) 02-0119-10

20 世纪 50 年代起, 以香港学生社团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群体因其敢言的作风被社会大众视为推动社会发展与变革的进步力量, 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而近年来, 香港青年学生频繁出现在反中乱港势力制造的非法事件尤其是香港修例风波中。据香港媒体报道, 截至 2020 年 5 月, 香港警方在修例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2.02.011

作者简介: 杨亚红,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研究”(21BKS028); 暨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项目(2021CXB029)

引用格式: 杨亚红. 20 世纪 80 年代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嬗变及现实镜鉴 [J]. 统一战线学
研究, 2022 (2): 119-128.

风波中逮捕的8000余人中有40%是学生，且低龄化趋势明显，最小的仅有11岁^[1]。这些情况表明香港学生群体的国家认同意识不容乐观。自202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简称《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社会逐步恢复平稳发展，以“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和“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为代表的乱港势力得到有效打击与遏制。但是当乱港势力“硝烟”退散，一个重要现象不得不引起重视，即“参与暴力活动的人主要是愤世嫉俗的年轻人和大学生，他们的首要斗争对象是特区政府和中央”^[2]。修例风波将香港部分青年学生当前在国家意识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暴露在公众视野下，也让以香港专上学生联合会^①（简称香港“学联”）和各大院校学生会^②为代表的学生社团备受社会关注。

回顾香港学生运动史，发轫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学生社团，最初强调反抗殖民、追求公义，关心社会、参与社会，认识祖国、回归祖国的立场^[3]。20世纪70年代，学生参与社会运动迎来高峰期。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香港学生群体的国家认同意识发生明显变化：青年学生的本土意识上升，逐渐认同英美等宣扬的西式民主价值观，并在香港改制改革中与港英当局站在同一立场。香港回归后，对“民主”的盲目追求导致部分学生社团深陷街头运动，全然不见社团成立之际心怀祖国、关心社会的初心。可见，20世纪80年代是以学生社团为代表的学生群体国家意识转变的关键期，对这一时期香港学生社团的研究极具学理和现实价值。

目前，关于香港学生社团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回顾、总结20世纪60、70年代的学生运动，主要反映学生社团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学生社团在推动香港社会发展与改革中的进步作用。二是探究香港回归以来，香港民主进程与社会运动对学生社团的影响，这些研究中不乏对学生参与社会活动的反思。从已有成果看，学者普遍认为香港的教育制度存在很大漏洞，尤其是国民教育的缺失和“去殖化”不彻底，是造成当前香港学生群体国家意识薄弱的主因；也有研究从“本土意识”“港独”思想等意识领域出发，认为社会思潮对香港青年学生产生巨大影响。既有研究对香港青年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进行了分析，但缺少关注香港学生群体从何时起、受何种因素影响导致其国家意识发生根本性转变。为此，本文将聚焦20世纪80年代，以香港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梳理与分析，呈现这一时期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的变化轨迹，探求现今学生群体深陷社会纷争的原因，深入思考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香港学生社团参与社会运动的概况与影响

20世纪60、70年代，家国观念是香港知识阶层推动社会运动的主要思潮^[4]。在此背景下，香港学生群体参与了一系列社会运动。1963年以前，香港只有一所香港大学，同时也存在十几间由内

① “香港专上学生联合会”成立之初有4个会员，20世纪60年代初增至6个（会员资格以学生社团为单位）：港大学生会、崇基学生会、罗师学生会、葛师学生会、香港工专学生会、广大书院学生会。香港“学联”于1960年4月正式向港英当局注册。其成立之初的宗旨是：对外代表香港学生；推动全港性学生活动；增加同学对社会的参与。香港“学联”代表会则由各大学学生会选派的代表构成。

② 主要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岭南大学的各校学生会（其中，港中大学生会是根据港中大大学条例设立的，其余均是在警务处注册的独立社团）。

地迁往香港的教育界、文化界人士组建的大专学院。自1949年香港大学学生会正式注册为合法团体，香港各专上学院及香港“学联”相继注册成为独立社团。20世纪60年代，学生会及香港“学联”密切关注香港教育和文化领域事项，先后发起过“文社运动”“中文运动”及香港大学校政改革等。1975年，香港“学联”提出“放眼世界、认识祖国、关心社会、争取同学权益”的口号，学生社团的活动开始频繁涉及社会政治议题。纵观20世纪70年代，香港学生社团参与的“保卫钓鱼岛”运动、“抗议英女皇访港”事件等相关社会政治运动，涉及民生领域的“盲人工潮”事件、“反加价”运动，反映出香港学生群体关注的领域已向社会及政治层面延伸。香港学生群体开始重新审视民族身份，重塑对祖国的认识。香港“学联”举办的“中国周”活动及多次发表中国认同声明的行为，表现出香港青年学生对祖国的关注。然而，由于特殊时代背景，香港青年学生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实体、国族认同不尽全面客观^[6]，甚至是碎片化的。

20世纪70年代，香港学生运动迎来高潮，青年学生群体的国家意识产生微妙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为学生社团中出现所谓“派系之争”。学生社团内部根据社会意识和行动路线的差异，分裂为“国粹派”和“社会派”。“国粹派”抱有强烈的爱国意识，认为香港应在各方面向内地靠拢，坚持走“认中关社”（“认识中国、关心社会”）路线。“社会派”成员们对内地“有太多保留”，不满于“认中关社”路线^{[3] 258}，主张开展立足本地社会的运动。20世纪70年代中期，香港学生群体中又崛起了“自由民主派”，其成员信仰民主、个体自由和基本人权等西方价值观念，更注重本土议题。学生社团内部产生了基于“内地与香港”关系问题的三种不同认识，这是意识形态领域变化的表现。

20世纪60、70年代，香港的学生社团之所以积极参与到社会运动中，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内地的政治形势对学生群体有极大影响，同时香港经济快速发展产生的阶级分化加剧等社会问题，使青年对殖民统治的各种不公正深感不忿。反殖情绪与民族意识的双重影响促使香港学生群体投身社会运动。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的影响波及香港学界。在这场源于美国的新左派学生运动中，反叛青年发动校园与街头运动，并将其态度与不满以流行艺术的方式进行表达，影响甚广，辐射到了香港学生群体中。可以明显看出，20世纪60、70年代，香港学生群体对国家和民族有着深厚情感与认同，尽管20世纪70年代经济腾飞让港人对香港产生更深的“归属感”，但香港学生群体的国家和民族认同依然占据主要地位。

二、20世纪80年代香港学生社团参与社会运动的过程及其意识嬗变

从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学生社团在反对日本篡改教科书运动中强烈的民族认同观念，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注回归后香港建设中崛起的本土意识，再到20世纪80年代末所谓“自由、民主”意识的高涨，香港学生群体在不同阶段表现出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不同认知与态度。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的转变有以下轨迹。

（一）20世纪80年代初期：民族意识浓厚与维护民族利益

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学生群体在反对日本“修改教科书”运动和抗议英国所谓“三个条约有效论”运动中，表现出浓厚的民族意识及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强决心。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后开始寻求其国际地位的提升，其国内掀起了一股否定侵略战争性质的思潮。1982年3月，日本政

府开展“修改教科书运动”，篡改侵华史实，由此引发了“教科书事件”。香港的民间团体及报刊强烈谴责日本篡改历史的行径。香港学生社团积极配合其他民间团体展开行动，以示游行和递交意见书等方式予以谴责。1982年8月5日，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委派三名代表到日本驻港领事馆，表达香港学界反对日本政府文部省篡改侵华史实的意见^[6]。次日，香港大专院校举行公开集会，抗议日本文部省篡改侵华历史。8月23日，香港“学联”发表《致全港市民书》，强烈谴责日本文部省下令篡改历史事实。港大学生会发起“血书运动”，500余人的献血现场打出“滴血成书、不忘民族苦难，众志成城、历史岂容篡改”标语，以此请求中国政府向日本施压。9月18日，160多个团体举行了香港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九一八”事变纪念集会，约三万香港市民参加。反对日本篡改教科书引发的学生运动，是香港学生群体葆有强烈民族情感的真实写照。

香港学生群体深厚的民族意识还体现在中英谈判之际，学生群体对英方否认历史不平等条约表示强烈反对。上文谈及的所谓“三个条约”分别是：1842年《南京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参加中英谈判时公开表示：“管理香港的条约，至今仍为国际法所公认，在双方未同意作出其他安排之前，英国将依条约处理香港问题”^[7]，英方以此为所谓法理依据企图保留1997年以后对香港的治权。此番言论引发了香港学生社团的抗议活动。9月26日，香港浸会学院学生会时事委员会发表声明强调，《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都是不平等的，应予以废除，更从国家统一的高度提出“收回香港主权是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7]。次日，香港“学联”下属的多所学校学生会采取集体抵制行动，拒绝派代表出席总督府为英首相举行的招待会。香港中文大学及香港理工大学学生会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不能接受英国首相（向北京提出）‘修改’条约的建议，这样等同于承认这些条约，无疑令我们的民族尊严再次受损”^[8]。学生代表在英国首相招待会场外高举“反对不平的条约”“侵华条约不容肯定”标语进行示威和抗议。

香港学生群体在上述活动中表现出浓厚的民族意识，尤其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对外事件中以实际行动展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坚定决心，这种强烈的认同意识是自香港各校学生会成立以来便延续的精神内核。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本土意识上升与关注政制建设

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学生群体的认同意识发生微妙变化，本土身份认同成为学生群体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在香港“前途”确定后，青年学生群体对香港未来建设展开热烈讨论，是其本土意识上升的突出表现。这种群体意识的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初现端倪：由香港“学联”举办多年的“中国周”在1982年停办，取而代之的是1983年开始举办的“香港周”，目的就是让青年群体了解并参与本地事务。同时，学生社团将工作方向调整为“建设香港民主”，揭开了学生社团参与香港政制建设相关社会运动的序幕。

中英谈判期间，当部分香港社会上层鼓吹英方提出的所谓“主权换治权”主张时，青年学生们表达了对中央政府政策的认同和信心。在所谓“主权换治权”行不通的情况下，英国转而围绕“高度自治”做文章，以所谓“最大程度的自治”来曲解“高度自治”的内涵。这一点迷惑了香港青年学生的“神经”，使学生群体的注意力转移到如何取得香港所谓“最大程度自治”的问题上。1984年4月16日，香港大学学生会发表的《香港前途宣言》指出：香港前途问题的解决，必须以保持香

港的稳定、繁荣与尊重市民意愿为大前提。香港大学学生会还提出包括“建立一个民主政府，由本港全体市民选举产生”，“香港应逐步推行民主化以过渡至高度自治的民主政体”等香港政制改革的原则^[7]¹⁷³。1984年7月22日，香港“学联”、港大学生会、港中大学生会和浸会学生会，参加了由43个民间团体组成的“代议政体绿皮书研讨联席会议”，并发表统一的意见书，要求香港政制改革应以“直接选举，还政于民”为目标。1987年港英当局公布《1987年代议政政治发展检讨绿皮书》，企图快速推进代议制改革。港英当局不断向香港市民灌输“自治”理念，让学生社团对香港政制模式产生超出现实的设想。

20世纪80年代中期，造成香港学生群体的本土意识上升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经济飞速发展导致港人出现“在地化”心理；二是港英当局在文化教育、意识形态领域的干涉。这一时期，港英当局进一步在教育领域深化所谓“去政治化”和“去中国化”，如1981年颁布的《学校德育指引》对于“国家”“民族”只字不提，将德育教育限定在“灌输知识，传授技能”^[9]层面。同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授意于英美的政治团体，将学生群体关注的焦点引向建立所谓“民选制度”。

（三）20世纪80年代末期：所谓“民主意识”滥觞与盲目参与社会运动

20世纪80年代末，香港学生群体陷入对所谓“民主制度”的过度推崇，盲目参与到一些社会运动中，这其中还受到外部势力的蛊惑。香港学生社团在这一阶段发生了质的变化。

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学生群体表现出对西方所宣扬价值理念的片面认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香港社会各界就政制改革问题进行了长期讨论，学生群体在由英美主导的社会舆论中浸熏多年，逐渐接受并认同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但由于缺乏对香港社会及政治的深层次分析，以及对英国所谓“改良”殖民统治的清醒批判，青年学生群体不假思索地接受西方宣扬的民主价值观，简单地将所谓“全民普选”与“民主制度”画上等号。学生社团在所谓“自由”“民主”意识驱动下参加政治运动，从根本上偏离了学生社团“关心社会发展、争取同学权益”的宗旨。

其次，外部敌对势力控制和操纵香港学生社团活动。美国政府向来重视通过文化教育手段掌控意识形态，采取所谓“学术交流”等方式拉拢香港学生社团。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通过所谓“福布赖特交流计划”及所谓“学术研讨会”，安排部分香港学生代表访问美国，以求促进“了解”^[10]。美国在香港地区运作的“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选择性地向香港学生社团提供资金支持，并扮演将所谓“学生领袖”引荐给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官员的“中间人”角色。美国与香港之间的所谓“文化交流”不仅为让更多青年学生接受美国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等现代化理念，更为培养一批亲美亲西方，且在校园内具有影响力的所谓“学生领袖”。香港地区一些学生社团在一些政治运动中暴露出有目的、有组织的特征，实际体现的是在幕后不断引导、利用学生的外部反对势力的意志。

20世纪60、70年代，以学生社团为代表的香港学生群体对国家和民族有强烈认同感，同时伴随着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愤恨情绪。但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香港学生群体在思想意识领域出现明显变化：首先，青年学生群体的“本土意识”逐渐增强；其次，香港学生群体受港英当局“洗脑赢心”工程及美国“民主输出”的影响，对其宣扬的西方价值观逐渐深信，形成了片面的“民主”观念。香港学生群体的认同意识变化受到港英当局统治策略以及美国对港政策等内外因素共同影响。

三、20世纪80年代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香港学生群体在20世纪80年代呈现复杂的认同局面，是主观意识受客观环境影响的体现，不仅被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还映射了东西方意识形态在香港这一特殊场域下的碰撞与交锋。20世纪80年代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的特征及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与本土意识共存且不平衡发展

20世纪80年代，香港学生群体在社会运动中表现出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与本土意识交织共存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香港与内地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较少，造成了香港同胞对内地复杂、模糊的情愫。这种情愫的产生，一方面是中华传统文化和思想延续的体现，另一方面是港英当局实行“去政治化”教育导致学生群体缺乏国家概念的后果。本土意识原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观念”^[11]，却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成香港人身份认同的主流。在复杂意识形态影响下，香港学生群体在思想上呈现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与本土意识互相交织的状况。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促使学生社团参与到反对殖民主义的运动中，受这种认同影响的学生运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

香港学生群体意识的另一个特征体现在其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与本土意识的不平衡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香港回归祖国已定，港英当局快速推进所谓“民主化”政制改革，吸纳受英式教育和认同西方理念的精英参与政务，企图让香港成为实际的政治实体。部分港人在此情况下沉溺于脱离实际的民主幻想，他们对即将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港人治港框架的期待，更多的是追求香港在中国政制中的独特地位与“高度民主自治”。学生社团在强烈的“主人翁”心态与高涨的论政热情推动下，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希望推动建立其期望中的香港政治体制。然而，学生社团对某些政治问题的理解片面，无论是主张“一人一票”进行普选，还是盲目参与政治运动，都是学生社团在政治上激进而幼稚的表现。

（二）资本主义制度与西方价值观被学生群体所接受

20世纪80年代，香港学生群体在意识形态领域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价值观由反抗到认同的转变。香港学生社团诞生之初，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与殖民统治强烈的厌恶和反对。如1978年3月4日，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里的一篇文章提到，港英当局统治下的香港“明显地就是一个政治垄断、经济剥削，而又意识腐朽的社会，普罗大众都是无时无刻地在资本主义及殖民主义的压迫下挣扎……”^[12]。这一时期香港学生群体对英国殖民统治普遍持不满的情绪和态度，但这并未阻碍香港学生群体接受资本主义理念及其价值观。这种意识变化不是短时期内形成的，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对港进行所谓“民主输出”的结果。冷战期间，美国以遏制共产主义为前提制定对港文化政策，以期将美国政策意图“有效传递”给目标群体。以美国中情局扶植的“亚洲基金会”为例，该机构作为推动亚洲反共活动的所谓“领导机构”，在香港主要通过文化出版及学术交流来影响青年学生思想意识。20世纪50年代起，“亚洲基金会”从出版业起步，创办了一批集研究、创作、出版、发行为一体的出版社，试图掌握主流话语权。当时在学生中较有影响的《中国学生周报》《大学生活》等均由“亚洲基金会”旗下友联出版社发行。1952年，“亚洲基金会”创立了由其全资赞助的“孟氏教育基金会”，更通过资助教科书项目为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提供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的教材。如有的学者所言：“亚洲基金会对香港中文大学的真正影响或许应当归结为，

名为保存中国传统，实为宣传美国‘文化自由’观念。”^[13]

美国对掌控青年学生意识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亚洲基金会”仅是其“民主输出”的典型个案。据统计，1954年至1978年，“亚洲基金会”从美国政府得到的资金大约为1.58亿美元^[14]，用于香港地区的经费不断递增。经过长达30年的渗透与发展，美国的所谓“民主输出”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及西方价值观为学生群体所接受。学生群体中有部分人士洞悉了美国上述举动的目的，并警示道：“美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更在香港、台湾设立文化机构，或收购文化机构及刊物，进行歪曲新中国事物的宣传进而制造新中国的恐怖景象。”^[15]但当时更多香港学生还是受到潜移默化影响并发生意识形态的改变。

（三）学生运动深受社会政见团体影响及政治化程度加剧

20世纪80年代，学生社团被集中涌现的政见团体裹挟着加入到所谓“民主政制”激论中，加深了其政治化程度。在中英谈判后期，香港涌现出一大批政见团体。如1981年，以大学教师及部分报社编辑为主要成员的“香港前景研究社”成立；1983年1月，一批从事教育、新闻、工商等专业工作的大专院校毕业生注册了“汇点”有限公司；同年，另一批香港青年成立“新香港学会”。此外，还有太平山学会、民主民生协进会、香港观察社等相继成立。这些政见团体的兴起受到香港“前途”问题、区议会选举、中产阶级对社会归属感、本土意识增强的影响^[16]，他们的共识是所谓“无论香港主权归属均应该实行民主”^[17]。英方的舆论造势诱使学生社团在政制改革问题上与政治团体态度一致。其核心观点主要包括：赞成香港回归，应建立香港高度自治的港人治港政府；现阶段发展代议制，提议尽快实现直接选举；未来可推行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等。学生社团不仅在观点上与政见团体相似，在行动上也多有配合。

上述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众多政见团体的成员本是各大专院校毕业生，天然地与学生社团存在广泛联系；另一方面则是美国等势力在背后推动学生团体与政见团体合作。“亚洲基金会”甚至直接组织和联系学生社团的活动。这开启了学生社团与其他社会团体尤其是政见团体密切相连的时代。1991年香港立法会开放直选议席后，部分政见团体整合为参政团体进行参选，加深对政制改革的干涉；学生社团亦步亦趋，开始视推动香港民主和政制改革为己任，试图通过非制度渠道解决问题。香港学生社团运动的这一特点及变化，为其在后来社会运动中的非理性行为愈演愈烈埋下了伏笔。

20世纪80年代，香港学生社团将目光集中在香港本土。香港青年学生从20世纪60、70年代对国家的积极认识和炽热情感，转向对本土身份的自我加固和对西方民主的盲目追捧。学生群体的意识转变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其影响因素除了香港自身经济社会状况，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构，即港英当局的“洗脑赢心”工程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外国势力的干预。自20世纪90年起，美国在香港青年学生中的渗透变本加厉。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项目公开资料显示，1994年至2018年其在港项目的总投入超过1000万美元；每逢香港发生较大社会波动之际，其在港活动资助数额便会激增^[18]。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成立的“香港美国中心”“香港民主研究所”等机构，通过参与编修通识教育教材、发表所谓“学术成果”和提供实习岗位等方式，不断向香港学校和师生渗透。多年来，外部干涉势力已在香港高校培植出影响学生社团的代理人，如非法“占中”发起人戴耀廷、“港独”组织头目罗冠聪等。2019年12月，中国对包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内的5个美国非政府

组织进行制裁，进一步铲除了这些“毒瘤”。

四、20世纪80年代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嬗变的镜鉴

20世纪80年代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的嬗变，表明政府在教育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和引导对青年学生认同变迁影响重大。时至今日，缺乏完整国民教育体系、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干预、西化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等影响因素依然存在。所幸，2019年以来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对社会整体进行刮骨疗毒，极大肃清了香港青年学生所处的教育和舆论环境，为青年学生重塑认同意识、学生社团回归本职提供了契机。20世纪80年代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的嬗变，对新时代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加强香港学生群体的国家认同教育提供了以下镜鉴。

（一）净化教师队伍，肃清教育环境

教师是学校教育的灵魂和关键，对教师的管理和培训是肃清教育环境的主要抓手。20世纪80年代，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变化受教育环境的影响巨大。回归后，香港教育根基未变，教育环境乱象丛生。比如，长期参与反中乱港的“教协”在学校和教师中产生很大不良影响。《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教协”因国安法的效力而宣布解散，这给净化教师队伍、加强师德建设营造了有利局面。香港特区教育部门需要改变以前只注重对教师的文凭与专业技能要求而忽视其“爱国爱港”基本价值取向的做法。香港特区政府应对教师的资质与操守有明确要求，强化师德建设，加强教师责任意识和专业素养，确保教师对学生进行正确的观念引导。香港特区政府已于2021年11月宣布公营学校新聘任教师《基本法》测试要求，迈出净化教师队伍的重要一步。在此基础上，香港特区教育部门还需大力推动香港师生到内地学校的交流互访，形成教育互学互进，使香港学生得以直观了解国家政策与社会状况。在学校教育中，教材是施教的载体，对学生认知起到重要作用。香港特区教育部门应详细制定对教材编写的标准与审查，杜绝使用扭曲历史、价值导向错误的教材。此外，向学生灌输错误甚至过激思想的不良教师应受到监管和严惩，决不允许别有图谋的教师将学生作为政治牺牲品，为学生营造一个清朗的教育环境。

（二）普及国民教育，打破外部干预

完善国民教育体系是培育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香港回归以来，学校教育始终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国民教育课程和体系，取而代之的反而是开设无统一教材评审和监督的通识教育科。通识教育科出现过分聚焦政治议题、强调二元对立等问题，其对香港学生群体造成的恶劣影响不断暴露。为改变这种情况，2020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相继宣布改革通识教育科、公布《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试行版）、推行国家安全教育、将国旗和国徽纳入中小学教育，拓展《宪法》《基本法》《香港国安法》的相关法制教育，培育青年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此外，要防范外部势力以所谓“民主输出”为目的、披着“学术交流”外衣的渗透。随着干扰香港教育的外部势力浮现在社会大众面前，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对个别机构实施制裁，从源头上切断外部势力向学校渗透。香港教育主管部门应考虑高校师生学术发展需求，为学界搭建有益的学术交流平台，提供学术合作机会，统筹教育领域官方或非官方的互动，注重与内地开展教学合作和学术交流。要建立健全国民教育体系，推进教育“去殖民化”进程，全过程培育香港学生群体的国家认同意识。

（三）构建主流话语机制，引导主流价值观念

任何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必然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且反映国家意志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流价值观及社交媒体对学生群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多年来，香港所谓“民主人士”及西方媒体已经形成了一套自洽的话语逻辑，通过话语蛊惑带偏学生认知，破坏内地与香港关系。要彻底扭转此种舆论形势，香港特区政府应当全力建构主流话语体系，积极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首先，香港特区政府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要秉持实事求是态度，从学理上溯本清源，为大众还原真实中国，正确解读中央对港政策，理性分析内地与香港关系，将研究成果以大众化方式向民众呈现。其次，香港特区政府应从法理层面应对反对势力煽动性的价值误导。香港特区政府需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严禁企图颠覆政府、威胁主权的话语传播行为，净化社会舆论环境，运用政府传播的优势建立起爱国爱港的主流话语机制。再次，香港特区政府需积极呼吁并监督新闻媒体恪守公正报道职责，从客观、正面的角度引导香港民众对国家政策、民生问题和国际社会的认识，建立起民众了解国情的有效渠道。最后，要注重新媒体技术发展趋势，发挥新媒体宣传优势，研究并确立针对香港学生群体乐于接受的宣传方式，扩大主流话语传播受众面，占领社会主流舆论阵地。

（四）发挥学校管理职能，推动学生社团回归本职

学生会作为学生群体的代表，其发展与动向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生群体的内部情况，应予以重视。作为独立的注册社团，香港的众多大学学生会原本应更好地为学生群体服务，但一些学生会逐渐偏离本职，成为搅动校园和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香港国安法》施行以来，在遏制反中乱港势力的颠覆活动和犯罪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渐消除了香港教育领域的“毒瘤”。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岭南大学等纷纷与学生会“割席”，不再为学生会的出格言行“买单”。2021年10月7日，在修例风波中利用校园作为乱港宣传平台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宣布解散。这表明《香港国安法》对反中乱港的学生组织起到了威慑作用。接下来，充分发挥学校对学生事务的管理职能，引导和规范学生社团回归学生事务、服务学生群体，成为香港教育部门和各高校的当务之急。一是校方可根据学生事务管理需求，成立由学校负责指导的学生会，作为学生与校方沟通的桥梁，及时表达学生诉求和组织文体活动，开展配合学校发展的学生工作。二是鉴于香港学生会的社团性质，学校可在保证其独立性前提下，对学生会在校内的活动进行规范，明确学生会的职责范围和行为准则，要求学生会活动遵守校规校纪。要引导学生会完善学生事务自治制度，支持学生会在教学科研、校园管理和学校发展工作中发挥合理作用。简而言之，香港学生社团仍然在学校和社会扮演一定角色，但不能以校园作为政治宣传平台是必须遵守的底线。

五、结语

香港学生群体向来葆有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与认同，这在20世纪60年代甚至更早时期的反英、抗日斗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现今香港学生群体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却暴露出香港存在的社会与教育问题。其国家认同意识变化的原因可在20世纪80年代学生社团的活动中窥见。影响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转变的因素，除却资本主义发展和回归程序启动两项客观因素外，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主观因素。这就是西式教育制度移植、价值体系塑造和强势舆论传播等敌对势力为拉拢

香港学生群体而采取的手段，使西式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逐渐被香港学生群体所接受。时至今日，当初影响香港学生群体的种种因素仍未完全消失。香港特区政府应切实考虑青年学生群体的时代特点与发展需求，重点从教育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着手，建立起一个由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共同协助的认同培育机制，切实提高香港青年学生的国家意识与爱国情感。

参考文献：

- [1] 修例风波期间被捕者趋年轻化 李家超：有人利用青少年 [EB/OL]. (2020-05-15) [2022-02-11]. <https://www.chinanews.com.cn/ga/2020/05-15/9185257.shtml>.
- [2] 刘兆佳. 香港修例风波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J]. 港澳研究, 2020 (1): 3-12+93.
- [3] 远东事务评论社·香港问题小组. 学运春秋：香港学生运动 [M]. 香港：香港远东事务评论社, 1982: 81-83.
- [4] 杨晗旭, 徐海波. “他者即恶”——香港青年社会运动与国家认同的流变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6 (2): 11-15.
- [5] 吕大乐. 香港社会特征、本土认同、本土意识 [J]. 当代港澳研究, 2015 (1): 153-157.
- [6] 香港两大学学生会代表到日驻港领事馆表达香港学界反对日文部省篡改侵华史 [N]. 人民日报, 1982-08-06 (4).
- [7] 李宏. 香港大事记 [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8: 160.
- [8] 反对撒切尔夫人肯定有关香港的不平等条约 [N]. 人民日报, 1982-09-30 (4).
- [9] 曾盛聪. 香港青年的国民意识与爱国教育 [J]. 青年研究, 1998 (1): 12-16.
- [10] 罗亚. 政治部回忆录：港英政府最神秘的部门 [M].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亚太研究所海外华人研究社, 1996: 177.
- [11] 祝捷, 章小杉. “香港本土意识”的历史性梳理与还原——兼论“港独”思潮的形成与演化 [J]. 港澳研究, 2016 (1): 12-22+93.
- [12] 否白. 无可奈何花落去——论中国外交政策下香港学生运动的发展 [J]. 学苑, 1978-03-04.
- [13] 张杨. 亚洲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背后的美国推手 [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5 (2): 91-102+127-128.
- [14] 张杨. “前线”外交：冷战初期美国在香港的文化活动初探 [J]. 美国问题研究, 2015 (2): 22-44, 198-199.
- [15] 吴靖华. 路上怎样走出来的？——综谈近年来的学生运动 [J]. 中大学生报, 1974-09-01.
- [16] Lo, Shiu-hing.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in Hong Kong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7.
- [17] 杨森. 香港社会改革 [M]. 香港：广角镜出版社, 1985: 35.
- [18] 杜佳: 美国民主基金会这样搞“颜色革命” [EB/OL]. (2019-08-21) [2021-12-02]. https://m.guancha.cn/DuJia/2019_08_21_514467.shtml.

责任编辑：孙德魁